



主编 宋红波 沈国环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研究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18077）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研究

主 编 宋红波 沈国环
副主编 耿殿磊 章木林 张 淳
编 委 陈春梅 陈 玲 程 宏 冯 婕 郭 晶 耿殿磊
何 清 刘 妤 姜岳慧子 吕 鸣 牛婷婷 沈国环
宋红波 汪 睿 吴俊昊 吴 月 谢晓涵 姚 刚
张 淳 章木林 周德艳 周 岚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研究/宋红波,沈国环主编.—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12

ISBN 978-7-307-21491-0

I.一… II.①宋… ②沈… III. 外语教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国 IV.①H09 ②G5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79917 号

责任编辑:罗晓华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箱: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邮科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0.75 字数:492千字 插页:2

版次:2020年12月第1版 202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1491-0

定价:60.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宋红波



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院长、硕士生导师，湖北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翻译学。先后主持省部级、市厅级项目8项，获省级教学成果奖2项，出版教材、专著3部，发表论文30余篇。

沈国环



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主持或参与省级、校级项目5项，主持在线课程1门。

前 言

自 2013 年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和国际性组织加入到该倡议中来，“一带一路”已经超越了其传统的地理概念范围，成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建设“一带一路”既是中国国家倡议，又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中国作为倡议的发起国，积极推动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内的合作与交流。“一带一路”的纵深发展给参建各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发展机遇，比如更加广阔的市场、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正在逐步从一个资本和技术进口型的国家发展成为技术和资本出口型国家，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中国面临着语言不通、文化冲突等挑战。

从国家战略层面上来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外部环境与稳定的市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领域的合作，有利于构建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我们需要全方位了解这些国家，才能与它们顺利合作。《“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研究》响应我国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研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分析这些国家的语言国情，有助于我们从语言教育视角了解这些国家。

邓小平曾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个国家未来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当下教育规划和教育政策的制定。语言教育政策作为教育政策和语言政策的重叠部分，既有教育政策的因素，又有语言政策的因素，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政治治理目标或者发展目的而制定的有关语言教育的计划和措施。它反映了政府对国内各语言的定位以及态度。因而，了解“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

首先，研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语言教育政策，梳理这些国家的语言分布状况，有助于及时调整我国的外语语种设置和外语人才培养规划，加强国家综合外语能力建设，提升我国应对外语需求和解决文化冲突的能力。

其次，研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对汉语的国际教育与推广，尤其是其本土化工作至关重要。汉语国际教育的推广需要遵守所在国的语言教育政策、风俗和传统。汉语国际教育的本土化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语言和文化在当地的扎根与生长，这是中国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再次，研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对我国的语言教育政策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有利于我们从对比的角度来审视国内的语言教育政策，吸取他国优秀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强化我们已有的成功的做法，更正或者摒弃不当的做法，在政策层面尽量做到科学规划、指导明确，以达到实践效果的最大化。

最后，研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语言教育政策，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些国家的国情和文化，有利于减少合作中的误解甚至是摩擦，为我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大环境。

这也是我们编写此书的初衷。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项目编号:2018077),并得到了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国际学院师生的鼎力相助。在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武汉大学出版社游径海主任和谢群英编审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一并对所有促成此书出版的机构、组织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宋红波 沈国环

2020年2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1
1.2 “一带一路”与语言互通	3
1.3 “一带一路”与外语教育政策	4
1.3.1 “一带一路”与外语规划	4
1.3.2 “一带一路”与语言教育	6
1.4 研究思路与总体内容	7
第二章 语言教育政策研究总论	9
2.1 相关核心概念界定	9
2.1.1 教育政策	9
2.1.2 语言政策	10
2.1.3 语言教育政策	12
2.1.4 语言教育政策与教育政策和语言政策的关系	12
2.2 影响语言教育政策的因素	13
2.2.1 语言观	13
2.2.2 社会因素	20
2.3 语言教育政策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23
2.3.1 主体语言教育政策研究	23
2.3.2 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政策研究	26
2.3.3 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语教育政策研究	28
2.4 语言教育政策分析框架	30
2.4.1 语言的地位规划	30
2.4.2 语言的本体规划	31
2.4.3 语言的习得规划	31
2.4.4 语言的声誉规划	31
第三章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语言教育政策	37
3.1 亚洲国家语言国情与语言教育政策	37
3.1.1 阿富汗	37
3.1.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9

3.1.3	阿曼	43
3.1.4	阿塞拜疆	45
3.1.5	巴基斯坦	47
3.1.6	巴勒斯坦	50
3.1.7	巴林	53
3.1.8	不丹	56
3.1.9	东帝汶	61
3.1.10	菲律宾	64
3.1.11	格鲁吉亚	67
3.1.12	哈萨克斯坦	69
3.1.13	韩国	72
3.1.14	吉尔吉斯斯坦	75
3.1.15	柬埔寨	78
3.1.16	卡塔尔	81
3.1.17	科威特	84
3.1.18	老挝	87
3.1.19	黎巴嫩	90
3.1.20	马尔代夫	92
3.1.21	马来西亚	94
3.1.22	蒙古国	98
3.1.23	孟加拉国	99
3.1.24	缅甸	103
3.1.25	尼泊尔	106
3.1.26	沙特阿拉伯	110
3.1.27	斯里兰卡	113
3.1.28	塔吉克斯坦	116
3.1.29	泰国	118
3.1.30	土耳其	121
3.1.31	土库曼斯坦	124
3.1.32	文莱	127
3.1.33	乌兹别克斯坦	129
3.1.34	新加坡	131
3.1.35	叙利亚	133
3.1.36	亚美尼亚	135
3.1.37	也门	138
3.1.38	伊拉克	140
3.1.39	伊朗	142
3.1.40	以色列	144

3.1.41	印度	147
3.1.42	印度尼西亚	151
3.1.43	约旦	154
3.1.44	越南	156
3.2	欧洲国家语言国情与语言教育政策	159
3.2.1	阿尔巴尼亚	159
3.2.2	爱沙尼亚	162
3.2.3	白俄罗斯	165
3.2.4	保加利亚	168
3.2.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71
3.2.6	俄罗斯	173
3.2.7	黑山	176
3.2.8	捷克	179
3.2.9	克罗地亚	181
3.2.10	拉脱维亚	184
3.2.11	立陶宛	187
3.2.12	罗马尼亚	190
3.2.13	马其顿	193
3.2.14	摩尔多瓦	197
3.2.15	塞浦路斯	201
3.2.16	斯洛伐克	204
3.2.17	斯洛文尼亚	207
3.2.18	乌克兰	211
3.2.19	匈牙利	216
3.3	非洲国家语言国情与语言教育政策	219
3.3.1	埃及	219
3.3.2	埃塞俄比亚	223
3.3.3	布隆迪	226
3.3.4	刚果民主共和国	229
3.3.5	津巴布韦	231
3.3.6	肯尼亚	235
3.3.7	卢旺达	239
3.3.8	马达加斯加	243
3.3.9	马拉维	246
3.3.10	莫桑比克	249
3.3.11	纳米比亚	252
3.3.12	南非	254
3.3.13	南苏丹	258

3.3.14 尼日尔	260
3.3.15 苏丹	264
3.3.16 坦桑尼亚	268
3.3.17 乌干达	271
第四章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语言教育政策及语言能力困境	275
4.1 我国的语言国情	275
4.1.1 汉语语言状况	276
4.1.2 少数民族语言状况	277
4.1.3 外语状况	279
4.2 我国的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政策	280
4.2.1 主体语言政策及其教育政策	281
4.2.2 少数民族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政策	285
4.2.3 外语教育政策	288
4.3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的语言需求	292
4.3.1 语言作为发展经济的需求	293
4.3.2 语言作为融通文化的需求	295
4.3.3 语言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需求	295
4.3.4 语言作为国家安全的需求	297
4.4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语言能力困境及原因分析	299
4.4.1 国家总体外语语种能力较弱	299
4.4.2 通用语言文字的国内外地位困境	300
4.4.3 国民语言能力困境	302
4.4.4 语言技术能力困境	304
4.4.5 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困境	305
4.5 小结	307
第五章 “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语言教育政策的启示	312
5.1 完善外语教育语种规划	312
5.1.1 做好语种选择, 确立优先发展语言	312
5.1.2 依托区域优势, 优化语种布局	313
5.1.3 设立专门语言规划管理机构, 扶持外语研究机构	314
5.2 制定“一带一路”汉语传播规划	315
5.2.1 孔子学院	315
5.2.2 跨境办学	316
5.2.3 吸引留学	316
5.3 以需求为前提, 提升国民的语言能力	317
5.3.1 国民通用语能力提升	317

5.3.2 国民外语能力提升	318
5.4 提升语言技术应用能力	319
第六章 结语.....	322

第一章 绪 论

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中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发展构想。“一带一路”是对上述两个构想的概括和延伸，旨在借用“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向世界各国发出倡议，与沿线各国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通、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2013年11月，“一带一路”被写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上升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倡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三部委经国务院授权，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全面推进阶段。2017年6月2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特制定并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旨在进一步与沿线国家加强战略对接与共同行动，推动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蓝色伙伴关系，实现人海和谐、共同发展，共筑和繁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建设为主要内容。习近平主席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①作为一个宏大的经济愿景，“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互联互通为切入点，通过政治互信更加深入、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资源整合利用更加有效、人文交流更加广泛，践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②

根据最初的倡议构想，计划覆盖“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贯穿亚、欧、非三大洲，包括东南亚11国、东亚1国、南亚7国、中亚5国、西亚20国、中东欧16国、东

^① 习近平. 联通引领发展 伙伴聚焦合作——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14-11-09.

^② 习近平. 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 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016-09-03.

欧4国以及北非1国，占世界224个国家和地区的29%，总人口约为45.21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2.27%。《愿景与行动》同时还指出：“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可见，“一带一路”并非一个实体或机制，而是一个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它本质上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平台，没有绝对的地理界线。中国“一带一路”网的“各国概况”栏目指出：该栏目收录的国家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相关合作协议的国家。^①六年来，“一带一路”的实际建设情况进一步验证了该理念：中国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相关合作文件。就最新情况而言，2018年8月19日，乌拉圭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是与中方签订此类备忘录的首个南方共同市场国家，有望成为南美同中国交往合作的枢纽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在拉丁美洲的一个重要节点；2018年8月27日，希腊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成为与中方签订此类备忘录的首个欧洲发达国家；2019年3月24日，意大利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成为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西方七国集团成员。

2018年8月22日，中国驻瑞士大使耿文兵接受瑞士国家广播电视台“一带一路”专题节目采访时指出：“‘一带一路’的内涵有一个发展过程，由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拓展到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国家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合作伙伴。”^②基于上述理念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情况，本书介绍的国家并非仅仅是被纳入最初倡议构想的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是根据“一带一路”官网以及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时间节点为2018年9月10日，选取了80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包括亚洲44国、欧洲19国、非洲17国。同时对中国的语言国情和语言教育政策进行了介绍。

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古丝绸之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兴起了我国海上贸易的发展，并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丝绸之路不仅打通了中国与亚、欧、非各国之间商业贸易的通道，更架起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桥梁，推进和维系了欧亚大陆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文明繁荣，让世界开始了解中国、让中国开始影响世界。今天，中国政府再次借用“丝绸之路”这个历史符号，向全世界传递“和平、友谊、交往、繁荣”的核心理念，承载着沿线各国“共享、共荣、共赢”的发展愿景，已成为当今中国与国际社会（尤指周边国家和地区）对话交流从而实现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重要语境。随着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加深，“一带一路”倡议将赋予古老的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规划美好蓝图，为亚、欧、非区域合作注入新的活力，为世界的发展繁荣提供新的路径，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

^① https://www.yidaiyilu.gov.cn/info/iList.jsp?cat_id=10037, 2018-07-31.

^② http://www.fmprc.gov.cn/web/dszlsjt_673036/t1587421.shtml, 2018-08-22.

1.2 “一带一路”与语言互通

“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建设为主要内容，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民心相通的深层基础是有着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和相互融合，而语言作为人类的伟大创造，可会通中外思想、超越文化藩篱、推动文明创新，是促进人文交流、实现民心相通的根本保障，是服务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支撑。正所谓，“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①

习近平主席在《愿景与行动》中指出：国际区域经济协作、民间文化沟通、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媒体合作与志愿者服务都要依靠语言互通。语言互通是人与人之间使用能相互理解的语言进行的沟通，它是一种高层级的设施联通。^② 曼德拉曾经说过，“若你用一个人听得懂的语言和他交谈，你的话能进入他的大脑，若你用他自己的语言和他交谈，你的话能进入他的心灵”。通过掌握不同国家语言，特别是深度发展外语能力，可以全面了解沿线国家的文化意识、增进相互认同、促进文化交流，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具有重要作用。英语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外语，在其国际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建设某种程度上可将英语等作为通用语。然而，由于各国对英语的接受程度不均衡，加上有些民族对英语的认同度较低，英语并不一定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第一语言选择。“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倡议，相关国家在理解、认同和接受中国主张和做法、了解“一带一路”愿景的基础上才会愿意合作。为此，中国需进行积极有效的交流和宣介，该过程中若能有效使用当地语言，则更容易达到宣介效果。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化复杂丰富，宗教信仰各异，区域发展极度不平衡，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互通并非易事。

仅就官方语言而言，仅“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就达 53 种，属于九大语系。大部分国家从法律上讲都以单一的官方语言为主，但是，一些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如东帝汶、菲律宾、新加坡以及大部分非洲国家，都采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官方语言；14 个国家以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或之一），主要集中在西亚和北非；东南亚和南亚有 4 个国家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以俄语为官方语言（或之一）的国家有 4 个，集中在中亚和东欧；^③ 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除官方语言以外，沿线国家使用的非官方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数量也非常多，重要的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达 200 余种。

面对如此复杂丰富的语言文化状况，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交流问题是关乎“一带一路”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之一。因此，语言互通应包含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建设内容之中，应纳入“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国内研究者已针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互通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李宇明从国家转型角度指出尽快开展语言规划、实现语言互通的重要性，并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研究“一带一路”的语言状况，培育“一带一路”的

① 李宇明.“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 人民日报, 2015-09-22(07).

② 魏晖.“一带一路”与语言互通.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4): 46.

③ 王辉, 王亚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状况. 语言战略研究, 2016(2): 13-19.

语言人才，了解相关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使用习惯，充分利用语言技术，发展社会语言服务。^① 魏晖认为实现语言互通主要有四种途径，即：选择沿线国家比较常用的一种或多种国际通用语作为主要交际语，推行沿线国家比较认可的一种或多种语言作为主要交际语，提升个体语言能力，提升机器语言能力。^② 沈骑从国家外语能力的高度探讨实现语言互通的路径，强调开展国家语言规划、推进国家外语战略转型、提升国家外语能力对实现语言互通的重要性。^③ 赵世举从语言需求与语言服务的角度探讨语言互通的实现路径，将外语需求分析和调查作为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以及外语规划的重要依据。^④

综上所述，实现“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语言互通要求重新进行语言规划、加快建设国家语言能力、着力培养个体语言能力、全面推动社会语言服务发展。培养和储备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高层次外语人才，受外语教育政策的制约和影响。

1.3 “一带一路”与外语教育政策

外语教育不单纯是外语教学，它折射出时代的需求、国家的开放程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其发展与国家外语政策或外语规划密切相关。^⑤ 外语缺乏国内语言所具备的自然传承条件和应用环境，其发展尤其需要依靠人为的语言教育，外语教育政策因此成为外语规划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⑥ 也是国家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乎我国政治、经济、外交、国防、教育、文化以及国际地位的大事。^⑦ 语种选择是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重要问题，直接影响国家安全。^⑧

1.3.1 “一带一路”与外语规划

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竞争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而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是首要的任务。国家语言能力是一个国家掌握和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⑨ 是国家应对特定语言需求的能力。“一带一路”建设各个环节的实施都要以语言沟通为基础，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成为当务之急。作为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外语能力主要指国家处理海内外

① 李宇明. “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 人民日报, 2015-09-22(07).

② 魏晖. “一带一路”与语言互通.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4): 43-47.

③ 沈骑.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战略转型.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9): 9-13.

④ 赵世举. 全球竞争中的国家语言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 2015(3): 105-118.

⑤ 王克非. 外语教育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 外语界, 2011(1): 2-7.

⑥ 赵蓉晖. 中国外语规划与外语政策的基本问题.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1): 1-7.

⑦ 胡文仲. 关于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思考.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1): 131-136.

⑧ 仲伟合, 王巍巍, 黄恩谋. 国家外语能力建设视角下的外语教育规划. 语言战略研究, 2016(5): 45-51.

⑨ 赵世举. 全球竞争中的国家语言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 2015(3): 105-118.

各种外语事件,或运用外语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以一个国家能够掌握并使用的外语资源种类和质量作为重要衡量标志。^①当前我国国家外语能力尚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外语语种数量不足和语言资源结构不平衡,这与我国外语规划存在的问题不无关系。

长期以来,因缺少一个专门的机构协调和管理不同层次上的外语教育以及与外语有关的政策和语言规划,导致我国在外语规划方面的战略意识缺位,长期聚焦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语言,对“一带一路”区域的语言关注不多,外语语种的规划与布局、外语人才培养的数量和水平、外语教育层次间的衔接等都缺乏中长期战略规划,存在资源投入不足、配置不合理、语种数量偏少、结构不均衡、非通用语种专业发展严重滞后等诸多问题。与许多国家相比,我国现有的语种规模尚存在较大差距。比如,美国可教授的语种达153个,仅哈佛大学就开设了95个语种(包括语种课程和语种专业),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开设93个语种,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开设124个语种。^②相比之下,在目前世界上仍在使用的6000多种语言中,我国有所了解的仅有100余种,在2015年之前,开设课程的仅60余种,能够较好使用的仅20种左右,^③2016年之前,参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通用语种为56种,中国高校开设的课程仅包括其中13种,语种覆盖率仅为23%。^④

为此,我国教育部于2015年正式出台关于加强外语非通用语种教育的文件,小语种专业建设已成为学校语言教育和课程开发的重点对象。在2017年教育部公布的新设本科专业中,有一半是小语种专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外语教育的语种规模、语种布点与资源投入,有助于缓解小语种人才欠缺的问题。然而,现有外语语种规划尚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非通用语种专业和课程设置缺乏科学调研,一些办学水平不高的学校也开始盲目设置一些非通用语种专业,也许几年后就会出现部分语种人才培养过剩、培养不精、语种分布不均衡等问题。^⑤高层次外语人才规划定位和目标尚不清晰,导致现有语言人才储备相对于国家战略需求仍存在较为严重的供需缺口和结构性失衡,语种数量和语种结构难以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因此,亟待进一步完善外语语种规划、加强“一带一路”非通用语种人才建设。

语种规划是外语规划或外语政策的核心基础,主要涉及关键外语或战略外语的语种选择。国际著名语言政策学家博纳德·斯波斯基指出,“语言政策就是对语言作出选择”^⑥,并且是关于语言与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系列有意识的选择,与特定的国家和特定的历史背景相联系。为尽快统筹制定能服务于国家外语能力建设需求、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提供语言保障的外语语种规划,应统筹国内和国际语言生活两个大局。我们既要实事求是

① 文秋芳. 国家外语能力现状. 选自:教育部语言文字管理司.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2).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② 张天伟. 国家语言能力视角下的我国非通用语教育:问题与对策. 外语界,2017(2):44-52.

③ 赵世举. 全球竞争中的国家语言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2015(3):105-118.

④ 仲伟合,王巍巍,黄恩谋. 国家外语能力建设视角下的外语教育规划. 语言战略研究,2016(5):45-51.

⑤ 孙吉胜. 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与“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 公共外交,2016(3):53-59.

⑥ 博纳德·斯波斯基. 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的重要论题. 张治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

地分析我国的外语国情，探讨国内语言生活、语言生态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策，更要分析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生活、双边和多边交流中的语言使用，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和教育等多领域状况开展外语能力需求调查，着眼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和语言需求。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及时调整我国的外语语种规划或外语政策，重新进行语言资源配置，作出具有战略价值的外语语种，即关键语言或战略语言的选择。一方面，我们要改革现有的外语语种比重及教育分布布局，加大非通用语种比重，特别是亚、非、拉国家等语言在外语教育规划中的语种数量及教育规划，以改变英语为主要外语语种的局面、解决“单一型”外语语种失衡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平衡关键语言、小语种语言、通用语言及非通用语言之间的关系，以避免语种选择和语言资源配置的单一性。相关部门需要从国家层面规划，哪些语种属于关键性语种，哪些是次关键语种，哪些属于迫切语种。这样语言院校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本着既着眼当前，也兼顾未来的原则，保质保量，有序推进。

由此可见，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应服务于国家和社会整体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表明我国国家战略定位已发生重大转型，意味着我国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将面临新的战略转型任务，^①这将为我国外语教育带来新的挑战 and 机遇。外语语种规划是外语教育政策的基础，外语规划落实以及外语人才培养必须以外语教育政策为保障。因此，在做好外语语种规划、作出关键或战略外语选择后，我们应思考如何最大化发挥外语教育在外语人才培养及战略储备中的积极作用。

1.3.2 “一带一路”与语言教育

外语教育是中国语言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国家总体战略的有效实施和国家外语能力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我国高校的语言资源配置、专业规划、学术研究以及外事活动等教育工作应面向“一带一路”沿线的语言态势，积极应对“一带一路”的语言发展需求和教育支持责任。然而，我国相关部门对国外的外语教育政策和措施缺乏足够了解，致使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存在外语教育整体规划缺失、外语教育理论研究和创新意识缺失、高水平外语人才培养规划缺失等问题。^②尽管我国外语教育已取得一定的成就，如国民语言实践能力有所提高、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得到重视、大学外语教学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等，但因相关部门很少从语言战略和政策规划的角度对外语教育进行有效管理和指导，使其关注点在于个体发展的实用性而不是自觉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利益，导致我国外语人才培养模式较为单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很多是非通用语，文化也不像英美文化那样为中国人所熟悉，因此，在学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的同时学习当地的文化、民情、国情尤为重要。然而，我国外语教学中普遍存在“重语言、轻文化”“重工具、轻人文”的弊病。以上情况导致我国外语教育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对“通语言、懂文化、熟悉专业知识”的高端人才的需求。

^① 沈骑.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战略转型.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9): 9-13.

^② 胡文仲. 新中国六十年外语教育的成就与缺失.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9(3): 163-169.